

初

主编 李骞

云上文丛 02

抗战时期昆明的 文化空间与文学表达

王 佳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主编 李骞

云上文丛 02

抗战时期昆明的 文化空间与文学表达

王 佳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时期昆明的文化空间与文学表达/王佳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5203-1273-8

I. ①抗… II. ①王… III. ①地方文学史—抗战文艺研究—昆明
IV. ①I209.9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193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慈明亮
责任校对 赵雪娇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2
字 数 229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王佳 90 年代后期上大学时，我给他们上现代文学史课。她在课堂讨论、作业论文里，都透着聪明。后来她保研跟我念硕士，对诗歌、小说的理解也很不错。在应试教育模式下，考入中文系的学生，并非全适合弄文学；文学感觉和语言表达都好的，也不十分常见，而王佳恰是有天赋的那类。可惜她不甚用功，读书随性，享受自由。硕士毕业后，从北京到上海，又从上海回昆明，日子过得悠悠达达。忽有一天想起考博士，却离开“学术”好些年了。生孩子，本该安排在无所事事的那些年，她却凑到读博时一齐办。因此，她博士论文做得比一般人辛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以抗战时期昆明为研究对象，是我为王佳定的题，尽管我自己并不擅长这个领域。研究“文学中的城市”，不同于“城市文学”（如海派文学、京味儿文学等），重心在城市。最近十多年，赵园先生的《北京：城与人》和李欧梵先生的《上海摩登》，以迥然不同的论述风格，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展现在我们面前；其后，以城市为对象的文化研究，俨然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一个新的生长点。陈平原先生率众弟子对北京、天津的研究，他和王德威先生主编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论丛对北京、上海以外更多城市的关注与研究，启人良多。而对昆明的研究，至今阙如。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乡土中国”的观念与伦理，往往构成都市文化的底色，而昆明无疑又是其中最具乡土色彩的城市之一。尽管这座城市具有悠久的历史，晚清以来其追随“现代”的步伐，也并不亚于中国其他都市，但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它仍然保持小城寡民的悠然状态，以致

当地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青年恨铁不成钢。全面抗战打破了昆明的宁静，北方和内地大量教育机构和人口的迁入，滇缅公路、中印公路、“驼峰航线”等国际战略通道的开设，使之在短短几年间，由“天末遐荒”的边陲小城，变为现代中心城市。这种身份的剧变，必定伴随文化的震荡。以往，昆明多作为西南联大及其作家群活动的背景被言说；现代文学中有关昆明的描述，也多出自外地人——无论是作为流浪过客的文艺青年艾芜，还是天之骄子的西南联大学生汪曾祺、鹿桥等。但昆明这座城市，在突然涌入大量人口、变为抗战重镇后，它“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它的文化形态发生了哪些变化，却并不为人所知。王佳所关注的，便是在这骤然到来的命运突转和现代化契机中，昆明这“城与人”的感受、变化和文化创造。

王佳生于兹长于兹，做此论题，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不过，要把熟悉的城市变成有距离的审美/研究对象，并不容易。何况，昆明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屡经沧桑巨变。王佳熟悉的昆明，与她要论述的昆明，其实完全不是一回事。在跟我商议博士论文题目时，她多次表达担忧，而最终拗不过我的坚持。我知道，她对昆明之“不了解”，不但源于其沧海桑田，也源于那些变动之间缺乏自然的逻辑。为此，只好依靠史料，由历史材料，帮助建立起对历史的感觉。做博士论文的这几年，王佳几乎换了一个人。她一头扎进旧报刊中；查找和阅读报刊文献，差不多占据了她的博士学习的大部分时间。最初两年，她经常为阅读后的茫无措感到苦恼。所幸她以顽强的毅力坚持了下来。当终于从历史碎片中拼合出“现场”，并最终触摸到历史的脉动时，她对于这篇论文的写作，才有了信心。由于材料功夫相对做得较足，她以翔实史料还原出的历史细节，生动可感，结论也大多比较可靠。如果说“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①，王佳的论文，就是力图厘清和呈现在抗战这一动态时刻，昆明城这种双重建构的过程和细节。涂尔干认为，每一种城市都创造一种心

^① [美] 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和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

灵状态，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确定的准则以调节人们的行为，而那些准则会内化为人们的个性的一部分。^① 王佳的论文，不但生动呈现了昆明在文化心理上从“边缘”到“中心”的过程，而且通过大量文学文本，揭示了昆明如何在“被迫”成为国际性都市时，仍然以其质朴宽厚的文化创造了40年代昆明人（包括新移民）的“性情”。这个研究，填补了现代文学中都市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由于绝大多数材料都来自第一手，相信该论著也将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材料和线索。她对一些作家作品原始版本的发现，也很珍贵。

当然，王佳目前的研究，尚有一些遗憾和缺陷。她对历史的还原与建构，完全依赖报刊史料，难免有时见木不见林。方志阅读和晚清民初历史把握得不足，使抗战时期的展开缺少从容的参照。还有，论及“本地”，语言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面向。当然，这些都需要足够的时间去深入细致思考与论述。历史研究，倘缺乏历史哲学的支撑和对历史的整体把握，便很难从碎片化的材料中建构起完整的历史形象。所幸研究就是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我愿与王佳共勉。

昆明作为一个“文学中的城市”，王佳的研究是一个较为扎实的开端。我愿意认为，它也是王佳今后学术研究的新起点，书中的不足、未及详论并值得发掘的有趣问题，都是可以大做文章的。期待王佳继续努力。

杨联芬

2017年9月12日于北京

^① [美] 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和文化的历史》，吴子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目 录

导论	(1)
一 抗战时期的昆明:文学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1)
二 视野与角度:相关研究综述	(6)
三 城与人:研究思路与章节设计	(11)
 第一章 抗战前的昆明:趋向“现代”的城市文化空间	(15)
第一节 城市空间的演变:从“华族化”到“现代化”	(15)
第二节 心态与表达:追慕“现代”与“自我”成长	(27)
第三节 从“旧”趋“新”的城市文化空间:自我想象与 外来触碰	(42)
 第二章 相聚与融汇:“外来”与“本地”共建“文化城” (1937. 7—1940)	(54)
第一节 从“圈外”到“生活组织战”:昆明文化秩序的 “内地化”	(54)
第二节 “新移民”昆明体验的建立:城市的“中心”与“边缘”	(70)
第三节 抗拒“摩登”与《昆明杂记》风波:面对“外来”的 复杂心态	(86)
第四节 “文化城”的共建:“剧运”的现代洗礼与刊物的 本土建设	(97)

第三章 空袭与疏散:战争中文化空间的开拓(1940—1943)	(119)
第一节 空袭中的昆明城:文化氛围的转变与战争 心态的表达	(119)
第二节 “不同的河水”:疏散中的“本地”与“外来”	(139)
第三节 沈从文的呈贡:心灵栖息地与现实观测点	(156)
第四章 顺应与反思:商业城中的现代表达(1943—1945)	(178)
第一节 “软性”文学与小报短刊繁盛:“商城”的现代图景	(178)
第二节 都市畸变体验:西南联大诗歌的现代性生成	(198)
第三节 抗战胜利前后的昆明:“内地化”语境中的 现实与展望	(212)
结语	(227)
参考文献	(232)
后记	(241)

导 论

一 抗战时期的昆明：文学研究的意义与方法

或许由于当代中国对城市化的强烈渴望，以及城市本身与“现代性”的密切联系，城市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一个研究热点，21世纪之后还有愈演愈热之势。在这一研究热潮中，“文学”以更富感性色彩的想象与追忆角度加入其中，在文化积淀浓厚的北京、“摩登”都市上海等中心城市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对香港、西安、重庆、天津甚至开封等城市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呈现^①。这些城市于“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序列中获得了它们的身份归属，而在这一研究序列中，昆明却似乎成了一个“失语”的存在。

“失语”的原因显而易见：作为地理与历史双重意义上的“边城”，昆明“到了明时才真正的开化，或者说真正的华化”^②，抗战末期借助外来力量移植才勉强达成“内地化”，“即由独立隔离状态转变为与内地完

^① 这些研究中以对北京、上海的研究为最多，如杨早《明末民初北京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专著）、颜浩《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专著）、季剑青《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产生：1928—1937》（专著）、葛飞《戏剧、革命与都市旋涡——1930年代左翼剧运、剧人在上海》（专著）、[美]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专著）、张英进《民国时期的上海电影与城市文化》（专著）、杜英《重构文艺机制与文艺范式（上海1949—1956）》等。其余几个城市的研究则有郝明工《陪都重庆文化与文学考论》（专著）、《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论文集）、《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论文集）、《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论文集）、黄育聪《文人群体与现代天津的文化空间》（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3年）等。

^② 楚图南：《云南文化的新阶段与对人的尊重和学术的宽容》，《新动向》1938年6月刊号。

全一致而成为中国不可分的一部之局面”^①，至今在“现代化”发展大潮中，虽因省会地位忝列“二线”，但实际在经济地位、城市建设、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仍与沿海、中原等地区的发达城市有不小差距。与不够“发达”的城市面貌相伴随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不够出色的文化呈现，虽偶有个人或作品或文学现象的出彩处，却也似乎不够支撑起一个相对完整时间段内的城市魅力。作为文学研究的主体，昆明缺乏足够的亮点。

让昆明这座城市出现在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中，要感谢的是抗战时期^②的西南联大。因为西南联大毋庸置疑的研究价值，使作为其地理坐标的昆明亮相于文学史，并因为其“背景”意义在已取得丰硕成果的联大文学研究中“蹭”到一点儿关注。例如作为“大学文化”视野中西南联大研究“开山之作”的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一书，在述及联大的到来时，就作为背景提到“龙云治下的云南”，介绍“云南王”龙云在20世纪30年代统治云南时所作的一系列改革，由此等到抗战时期联大入滇，“云南人民又义无反顾地跟随龙主席抗战建国，办理积谷，兴修公路，敞开胸怀迎接南渡西迁到滇的各路人马”^③。还有在史料搜集方面下了“涸泽而渔”功夫的易社强（John Israel）《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在勾勒联大与外界诸因素的“交互影响”时，也注意到迎接联大进入的昆明。在易社强看来，1938年的昆明城外观上“是一个沉睡的、偏僻的东方城镇，且带有些许法国风情”^④，本质上则农业气味浓厚，仅有“一丁点现代气息”^⑤，面对更为“先进”的外来者还带有某种“自卑情结”^⑥，联大师生置身其中，犹如“乡下人当中的世界主义者”^⑦。

① 陈友松：《云南教育感言》，《云南日报》1944年8月14日。

② 本书中的“抗战”都是指全国性抗日战争（1937.7—1945）。

③ 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65页。

④ [美] 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91页。

⑤ 同上书，第92页。

⑥ 同上书，第96页。

⑦ 同上书，第94页。

可以看出,在以姚丹和易社强为代表的西南联大研究者眼中,抗战时期的昆明价值正在与联大的相互关系中体现,而且这种关系也是在更偏重于联大的角度上结构,联大总是作为关系的主动者,而昆明是被动者。这种关系的牢固缔结以及其根深蒂固的接受使抗战时期的昆明得以出现在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却也掩盖了它成为具备独立研究价值主体的可能。那么,如果跳出昆明作为联大“背景”的固有思路,跳出两者关系主动与被动的习惯性划分,抗战时期的昆明,是否有成为独立研究对象,进而走入“文学中的城市”研究序列的可能?

近年来,在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开始提倡从“现代化”的角度来探讨问题,抗战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防御性战争经由“防御性现代化”^①概念的引入,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一环”^②。把战争中国“应对现代侵略战争的这种组织力日渐形成的过程”视为其“现代民族国家”的渐进过程甚至“枢纽”^③,成为一种新的学界共识。在这一现代民族国家抗战时期的建构中,中国由于其内部存在着的广泛区域与地方差异,各区域之间的现代进程与具体脉络又各不相同,“‘现代中国’——学生、平民和城市精英——从中国沿海地区向内地的被迫撤退,造成促进‘心理统一’的强大压力,并加强了过去联系微弱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认同感”^④,抗战背景下“现代”从发展程度较为先进的中原与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进入较为落后的内陆腹地,不仅加强了中国社会各区域阶层之间的联系与“认同”,也在客观上加快了广大内陆地区的现代发展步伐。

作为抗战中的“后方”,西南地区在战争中经历社会变迁的历程中,

① 费正清在探讨晚清外国侵华对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刺激时提出了“防御性现代化”的概念,近年来的历史研究中,一些学者将这个概念引入,探讨中国在抵抗日本侵略的同时如何通过“防御性现代化”达致战时状态的发展,并实现国族认同与国家重建,参见袁成毅等《笔谈抗日战争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② 马勇:《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一环——从抗战期间中国学界深层思索说起》,《北京日报》2015年7月13日第19版。

③ 杨奎松:《抗日战争:使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文汇报》2015年8月28日第T02版。

④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也存在着指向“现代化”发展的“突发性”“跳跃性”跃进^①。在这一历程中，以往被中原地区视为“天末遐荒”的云南经历了“从边疆到门户”^②的巨大变化，其省会昆明在云南诸城中更得风气之先，可以说其发展脉络正是抗战历程中云南巨变的缩影与“放大”：战前的“偏远山国”到战争中期已“俨然一大都市矣”，到战争末期更因中印公路、驼峰航线等国际战略通道的会集而为世界瞩目，成为国际知名的现代都市，“街心里流动着各种装饰的男人女人。华贵的狐腿子尖大衣，光润的卷发，木炭画成的眉毛，草绿色空军式眼镜，短裙，裸露的大腿，搂在盟国空军臂弯里，搂在发财者的臂弯里的，进出那些咖啡馆，小吃馆，电影院”^③，这种时髦都市的风貌原本属于“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④的摩登上海，经过短短几年却在战争初期街上连吆喝“卖报之声”都没有^⑤的边疆农业小城出现，这种极具跳跃性的巨变使得抗战时期的昆明在“现代”光影的烛照下开始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城市魅力：它首先来自“变”，来自巨变之下隐藏的能量叠加和丰富呈现。

如果说，战争语境赋予昆明的现代巨变已给这座城市“着魅”，那么在笔者看来，这种魅力中还拥有更多值得探寻的层次。首先，对于抗战时期的昆明，这种现代巨变是完全来自外来移植，还是自身发展衍进的产物？如果这一结果是两者“合力”的结晶（在很大概率上应该如此），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缔结和呈现？这个“关系”的构成与体现使笔者深感兴趣，并成为笔者所认为的抗战时期昆明城市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笔者看来，聚焦于抗战时期的昆明城，如果把我们已知的现代巨变的达成视为最终结果，那么从结果倒溯至起初的“相遇”，“外来”

① 潘洵主编：《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第76—78页。

② 参见丁小珊《边疆到门户：抗战时期云南城市发展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③ 静春：《晓东街之夜（速写）》，《文哨》1945年第1卷第1期。

④ [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页。

⑤ 战争初期内地旅行者来到昆明，惊异地发现这里“街头巷尾，既绝不闻呼叫卖报之声”，见李启愚《昆明风光》，《旅行杂志》1938年第12卷第1期。

(可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与“本地”两个“角色”如何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走近对方,如何因原生背景的巨大差异而误解、争执,经由怎样的沟通和融合(假定良好结果的达成都应该通过“融合”这一途径)后,又怎样在共同创造的新环境中得到彼此不同又相互联系的继续发展,并最终合力在抗战八年的时间段中极大地改变了昆明城——这一系列图景的探寻与勾勒正赋予了抗战时期的昆明迥异于其他城市的独特魅力。在这一系列图景中既可以更深刻地看到城市,包括其物质面貌的现代变迁、城市文化氛围的相应流变,还可以更细致地看到城中的“人”,包括面对外来“现代”冲击时如何焦虑于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的本地人,以及在“乾坤坍塌到西南”^①的巨变下艰难寻求自我重新定位(identity)的外来者(如沈从文),而探究心灵与考量人性,从来是文学的擅长。

论述至此,如果你也同意抗战时期的昆明已拥有成为“文学中的城市”的魅力,也具备以文学手段来探究的可能与必要,那么这个研究的题目已成立了一半。在这个题目下,笔者要注意昆明抗战时期的现代跃进,更想要研究这一巨变之中昆明文化氛围的变革及相应的文学表达,还有隐藏于上述这种种现象之下的“人”,包括外来者与本地人,他们在外界巨变刺激之下的自我塑造或者自我定位、心态变化及其在文学上的呈现——这个研究的范围显然已非传统的“城市文学”所能承载,其实也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中的城市”(偏重于研究文学对城市的想象或虚构)有所区别,于是笔者找到“文化空间”这一研究视角。

现代文化研究理论中的城市文化空间,既包含罗伯·克里尔(Rob Krier)所谓物质性的实体空间,又包含贯穿于其中的“人类主体精神的内涵”^②,是城市物质面貌和精神氛围的融合体。近年来这个概念常被引入文学研究,用以容纳超出传统文学范畴之外更为丰富广博的文化因素,从而扩大文学研究的外延并深化其内涵。把抗战时期的昆明置于“文化

① 浦薛凤:《浦薛凤回忆录》(中),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114页。

② 鲁品越:《当代文化空间的转型》,见《转型时代文化空间的建构(专题讨论)》,《学术月刊》2012年第11期。

空间”的研究视角之下，不仅可以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中综合考察城市的“物”“文”“人”等异质因素，又因此概念所原本凸显的空间因素而特别适用于“整合”此时突破空间限制而“相遇”的诸种文化力量，从而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细致地探究它们之间的联系。

“文化空间”这一文化研究概念的使用，也意味着本书在采用传统“语文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将引入文化研究的视野与方法，采用跨学科的思路，兼及文学、史学、人类学、地理、建筑、艺术等角度，目的是尽可能阐释抗战时期的昆明——这一“文学中的城市”的最大魅力与价值。而经由这种阐释和研究，或许不仅能够丰富我们对于抗战文学乃至现代文学的认知视野，同时也能以抗战时期的昆明作为一鲜活个例，反思中国文学乃至文化走向“现代”的复杂历程。

二 视野与角度：相关研究综述

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①，作为“区域文学”研究的细化，本身具有一定的研究范式：一般以某个城市为中心，研究作家的城市生活体验，作品的生产和传播，城市文化与文学思潮的关系，等等，研究方法也主要在传统语文学范围。作为这一研究类型的代表作，赵园的《城与人》与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却实际不局限于此：《城与人》细致探究“城与人的多种形式的精神联系和多种精神联系的形式”^②，《上海摩登》则以城市空间建筑、印刷文化、电影等元素与作家和文本并列，共同展现上海都市文化的斑斓图景。两部著作不仅突破传统语文学研究方法，研究意义也超越了传统研究范式，都指向文学与城市的现代性问题。与这两部著作“异曲同工”的，是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及其一系列城市研究著作所提倡的“都市文化研究”，倡导兼及历史与文学，关注“都市生活”中“城与人的关系”，使融

① 张英进在《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中谈及他的研究思路时说：“本书研究的不是‘城市文学’本身（那是一种具体的文学），而是‘文学中的城市’即文学与电影文本中想象中的城市”，参见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② 赵园：《小引》，《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会历史感与个人色彩的都市，能够成为解读“纷纭复杂的‘现代中国’”^①的一种维度。

依据视野更为开放和多元，并与中国“现代”进程始终相伴随的“都市文化”研究思路，在诸如理查德·利罕《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巴黎，19世纪的首都》，卡尔·休斯克《世纪末的维也纳》等一系列国外城市文化研究经典著作的启发下，不仅最为热门的上海、北京，还有香港、开封、西安、天津等一些相对冷门的城市近年来都在“文学的城市”研究序列中有了一席之地，有的城市还拥有了从多个角度阐释的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在理论、视角、思路、方法等诸多方面都对笔者的研究有所启发。

在现代文学视野中，昆明因为地域距文化中心的偏远，以及本土创作实绩的不够突出，相关研究一直处于一种比较贫乏的状态，对昆明的研究，也多伴随西南联大题目而来。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很多成果也从“背景”意义上，加深了我们对抗战时昆明的认识与理解。

如闻黎明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著作注重一手资料的搜集，在很多章节里援引昆明本地报刊的原始资料，如“轰炸灾难”一节，就引用昆明本地大报《云南日报》的系列报道，尽量逼真重现轰炸实况。这种“重现”对于著作本身当然是为了切实勾勒西南联大存生的背景，但对于我们了解战时昆明的全貌也有益处。

还有姚丹的《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该著作本身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大学文化”丛书中的一部，注重探索的是“文学的现代化”背景下，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来研究西南联大的“文学活动”。但为了切实分析这些文学活动所涉及的历史情境，著作也涉及对其时昆明的历史还原，比如“龙云治下的云南”，还有对当时昆明餐馆、茶馆等城市文化构成元素的叙述与比较。但这些叙述

^① 陈平原：《“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

多为构筑西南联大存生的背景出发，没有深入探讨这些因素于昆明本身的意义。比如论著叙及龙云 20 世纪 30 年代对于云南教育的一系列改革，如推举熊庆来为云南大学校长、聘请各类专家来云南任教等，这些现象如能与云南大学 1938 年申请“国立”的举措合并理解，本就是昆明教育文化欲融入全国、从而走上“现代”之轨的努力之体现，但作者只是把其作为“云南政府和云南人民满怀期待”“敞开胸怀迎接南渡西迁到滇的各路人马”^①的背景形成因素。角度的选取当然因为著作题目决定，但也为我们留下了可以再供阐释的角度。

另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是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这本可能是目前关于西南联大“校史”研究最好的著作，作者确实在史料搜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同时也敏锐地感受到西南联大与所在地昆明的某些交互影响，如对“联大与龙云”相互关系的勾勒与分析。但在具体勾勒这种影响时，作者更多注意到的是两者的文化冲突，更多分析昆明作为“只有一丁点儿现代气息”、拥有“自卑情结”的“乡下人”，对外来者（如西南联大）虽不至于“摩擦”却始终“格格不入”的尴尬情状，二者的互动也多半由联大（作为“先进者”）主动造就，如冯友兰题为《云南人与外地人》的演讲、联大学生走出校园，通过“到学校当老师，做家教，也做白领”来“与当地百姓打交道”^②等。那么，昆明城在外来“先进”文化强势进入的 8 年间，除了在空间上几近变为“外省人的世界”，它自身的文化现代性进程有没有受到影响或者改变？同时作为文化影响力更为弱势的“落后”昆明，对代表强势文化的外来者又是否存在反向刺激？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也为我们聚焦联大背后的抗战昆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思路。

对于抗战时的昆明，除了大量史料型的研究（也多与联大或其时南迁的文化人有关），研究视野中的昆明，多作为承载在此居住或游历的

① 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63—64 页。

② [美] 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版，第 104 页。

南迁文人的文化背景存在，如张新颖的《精神迷失的踪迹和文学理解的庄严——从〈黑魔〉看昆明时期的沈从文》，凌宇、张森的《论沈从文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于昊燕的《老舍在昆明、大理的经历与创作》等论文，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归结于作家研究本身，或探索其“文学新质”，或完善其“创作链条”。

还有一些研究涉及“文学中的城市”，探索呈现于创作文本中的抗战昆明，如明飞龙《抗战时期“文学昆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3年）及其《抗战时期沈从文、冯至的文学创作与“风景昆明”》《作为“北平”的昆明——抗战时期外省作家笔下的昆明形象考察》等系列论文，关注南迁文人对昆明形象的想象与表达，很多感受细腻而有新意，如针对抗战中来到昆明的很多外来者都有“昆明像北平”的感受，作者通过细致的文本阅读和理论分析，认为这一“想象”在情感“移情”因素外，主要源于昆明城市建筑及生活情调与北平的相似之处，给笔者的研究以启发。

还有如张永刚、朱奇琼的论文《文学记忆中的城市文化审思——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中的昆明为例》，书写昆明在联大和其他南迁者创作中的文学表现，而这些对昆明的“想象、抒写、塑造着昆明，使昆明形成独特的审美形象”，也丰富着昆明的“文化积累”，这篇文章还提及了研究“文学中的昆明”的一个现实意义：“为昆明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历史资源和现实启示”。此类研究还有张多的论文《西南联大文学作品中的昆明书写——昆明的城市空间对40年代内迁文人创作的影响》，该论文认为正是在昆明为联大等提供的“校园创作空间”中，内迁文人们又共同用文字书写着他们心目中的昆明，贯穿其中的是内迁文人们从“蛰居”到“栖居”的心态变化，而由此产生的西南联大文学，其独特之处正在于“创作主体对空间的暂时依赖意识”。值得注意的还有高兴的论文《文人与边城——抗战时期的昆明城市形象及其文化内涵》，该论文切实指出“以民国时期的边城昆明为考察对象”，目的虽还是“探究中国近现代文人书写的昆明历史形象，并解读其文化内涵”，但也涉及了民国昆明在现代文化史上的“边缘价值与抗战机缘”，认为正因为昆明的这种边缘